

大历史的国际关系学

任 晓

[内容摘要] 巴里·布赞和乔治·劳森的《全球转型》代表了一种大历史的国际关系学。历史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原本不可分,但近数十年来却受到社会科学中科学主义思潮的冲击,使本来的常识成为了一个问题。重视历史是英国学派国际关系学的特点,两位作者试图重新探讨国际体系和世界历史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历史的动因对于当代世界是如何组织起来的重大意义。当前,新的全球转型正在发生,世界正日益成为一个多中心或无中心的世界,也即布赞和劳森所称的“去中心的全球主义”。在这一意义上,作为大历史国际关系学的《全球转型》一书,为我们提供了探讨全球新转型的一种可行的思考路径。

[关键词] 大历史 国际关系学 《全球转型》

[作者简介] 任晓,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巴里·布赞和乔治·劳森两位杰出学者的《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大著,2015年被纳入著名的“剑桥国际关系研究”丛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①现中文版也已问世,这是值得祝贺的。这部《全球转型》代表了一种大历史的国际关系学,值得国际关系学人细细品味,相信它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将得到认真阅读。

历史与国际关系的研究本就是不可分的,然而近数十年来,却受到了社会科学中科学主义思潮的不断冲击,使本来的常识成为了一个问题。国际关系的研

^①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究在一些国家不同程度地走入了科学主义的歧途,在美国尤甚。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辨析,以达致拨乱反正之效。

众所周知,国际关系的思想源远流长,在西方常被追溯到修昔底德及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很多国家,这部战争史著是国际关系学课程中的必读书。这一事实本身就颇能说明问题,表明国际关系学的诸多问题乃至理论论争源于历史和史著。

就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国际关系学属于相对较为晚近出现的一门学科。就现代学科的分际看,国际关系学形成于19和20世纪之交。2019年,世界国际关系学界举办了不少活动,纪念本学科建立一百年。当然,这只是就狭义的现代学科分际而言的,绝非指国际关系思想理论的演进,后者需要以千年而论。

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期的代表性人物大都是历史家出身,可见国际关系学和历史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了以伍德罗·威尔逊命名的国际政治讲席。从早年担当这一讲席的学者看,他们多半为历史学家出身。20世纪前半叶,欧洲是世界事务的中心,国际关系学(IR)的中心大体也在欧洲,国联设立于瑞士日内瓦。1927年,瑞士在日内瓦成立了高等国际研究学院,以开展研究生层次的教育及科学研究。该学院在多年间建立了崇高声誉,被视为瑞士的“国宝”。后来,英国史家阿诺德·汤因比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工作期间主持编撰了卷帙浩繁的《国际事务概览》(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跃升为世界头号强国。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发生了转移,随之而来的是世界社会科学的重心也出现了转移,美国社会科学的地位大为上升,多年来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从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看,战后出现了新的趋势,即极重观察、验证和技术手段的行为主义(有时又被称为“科学行为主义”)风行一时。就社会科学哲学而

^① 上海译文出版社从1978年起陆续出版了《国际事务概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编各册,即:1.《1939年3月的世界》(上、下册);2.《大战前夕,1939年》(上、下册);3.《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上、下册);4.《希特勒的欧洲》(上、下册);5.《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上、下册);6.《战时中东》(上、下册);7.《大战和中立国》8.《1942~1946年的远东》(上、下册);9.《欧洲的重组》(上、下册);10.《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11.《1945~1950年的中东》,以及战后编按年份撰写的各册。1963年,《国际事务概览》停止出版。

言,实证主义取向的一套观念被奉为圭臬,布赞和劳森所称的“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m,相对于奥古斯特·孔德等早期实证主义者而言)日益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流行进一步削弱了国际关系学与历史的联系。

新实证主义在因果关系方面坚持某种规律性和决定性的观念。对于新实证主义者来说,有效的因果关系在决定性因素和规律性之间起要么推要么拉的作用:当A(决定性因素)时,则B(规律性)。假如一个特定的结果(Y)可追溯到某个特定的原因(X)时,那么此时的推断就是,一系列的结果(Y一类的规律性)就可追溯到一系列的原因(X一类的决定性因素)。研究的目标是验证这些对象/变量之间的协变。其深层的哲学保证是,存在着既相互独立又独立于我们观察者的对象,主客是二元的。

当这样一种新实证主义的因果思维和逻辑甚嚣尘上时,其他都变得等而下之了,历史相应地退居次要地位,甚至被边缘化。布赞和劳森在《全球转型》一书中对此作了一针见血的评断:

新实证主义的长期风行削弱了国际关系学与历史的关系。各种新实证主义者从历史中提取他们的数据资料,把过去视为验证其事先已确定的抽象主张之所。在这方面,19世纪对其也不例外,被用作一种无争议的背景叙述,服务于先已存在的理论种类。然而,这一路径的困难在于,它促进了一种选择性偏见,其中历史被化约为这样一种角色,即它已被充溢为要完成新实证主义的理论性抽象。如此一来,新实证主义就成为非历史的,运用历史去证明自己先验的结论、从中提取数据资料或作为事后解释的一个来源,而非一种有效的理论建构的工具。^①

经过“行为主义革命”后,历史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从社会科学中消失了,大行其道的是模型建构和理性选择,其信奉者以为,这些是普遍适用的,既适用于不同国家,也适用于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以及不同领域。于是事情便成了,只要运用了他们所声称的方法,一切问题便都能找到答案。这样一来,我们便在美国

^①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332.

社会科学的众多学术刊物上看到了充斥的模型、公式,灵动的历史和现实反而得不到省察,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学术取向。曾有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对作者感叹,该校有50位教授之多的诺大一个经济学系,竟没有一个人研究中国经济,好像只要运用了模型就能理解中国经济似的。流风所及,竟致有学者要惊呼“灾难正在制造中”。^①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一定的情境,也必须在这一情境下才能得到理解。这一情境很主要的一个部分便是历史,因而,社会科学中对历史、对过去的理解极为重要。要懂得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实际生活中最终所发生了的事,关键在于获得理解。不理解过去,就不大可能懂得现在和未来。譬如,不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就不会懂得中国的今天和明天。不掌握朝鲜半岛的历史,又怎能理解今天半岛上所发生的种种?

这就是历史社会学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它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历史赋予研究者看问题的厚度。国际关系研究有时被人诟病为门槛过低,比如在中国,只要某人平时看看《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就能够谈论世界形势和国际事件。如果国际关系研究停留于此,便成为过度的“眼前主义”(presentism),长此以往,它会使人迷失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具体事件中。而这一状况正是需要被超越的。一旦时段被拉长后,人们就更能看到在时间的流逝中所积淀下来的经验、智慧、教训、规律等等。当前,有的研究者对预测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颇为热衷。然而,若要比较靠谱地预估未来的发展,需要的恰恰是对历史和过往的把握。但笔者仍要提醒热衷“预测”的人士这样做的困难和风险,以及把握历史对于其做到大体靠谱的极端重要性。

2. 历史能够使人意识到或认识到事物的复杂性,避免简单化地看待问题。对历史懂得较多的研究者,一般会比所知不多的研究者更能够感悟到大大小小的事件、人物本身及其背后的复杂特性,看到事物发展变化中存在的偶然性,认识到不少事情并非“必然”发生,因而在下结论、作断语时保持谨慎和敬畏的态

^① Chalmers Johnson and E. B. Keehn, "A Disaster in the Making: Rational Choice and Asian Studies,"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36, 1994, pp. 14 ~ 22.

度。

较多地懂得和把握历史也使人更能认识到人类所生存的世界上文化的多样性,世上有不同的地理区域,有多样的文化传统,它们经历过可能十分不同的历史演进过程。各国存在多样但各自都发挥了作用的制度,不同宗教也各具力量,等等。看到这些,将使人在分析问题时更能具有“同情的理解”,而非轻率地认为某种文化、某种制度是“最好”的文化、制度、做法等等,因而更有可能保持谦虚的态度,努力理解和尊重异国或异文化。

3. 历史是任何理论建构所不可或缺的思想材料。任何一种理论建构的努力都不能凭空进行,都需要各种思想材料,而历史正是其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否则理论建构工作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正是经典性的、能发人深思的理论所区别于模型、公式之处。模型、公式是不顾情境、不要历史的,自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之所以有人会迷信模型、公式,通常是因为他们像看待自然科学那样看待社会科学,混淆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根本性质,以为在做法上越像自然科学也就越“科学”。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谬误。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世界而非自然世界,社会世界从根本上说是有关人和人的思想、活动、行为,而涉入其中的,有种种不同情境条件下影响个体与集体思想和行为的种种复杂因素。对于它们,需要研究者借助对历史的深入把握来加以认识和理解。

重视历史正是英国学派国际关系学的特点,也是其思想力和深刻性的来源。多年前,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肯尼思·汤普森大力支持下,作为英国学派孕育和成长之枢纽的“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British Committee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就是由任教于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赫伯特·帕特菲尔德发起和领导的。帕特菲尔德在1959~1966年间任该委员会主席,委员会的不少会议也通常在剑桥召开。委员会的另一位骨干成员、第二任主席(1967~1971年)马丁·怀特视思想史为根本,以马基雅弗利、格劳秀斯、康德的思想为国际理论的“三种传统”,^①他的《国际理论的三种传统》一书充满了思想史的意蕴。赫德利·

^①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Gabriele Wight and Brian Porter, eds.), Leicester and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1.

布尔也有专文探讨格劳秀斯及其思想传统的绵延。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先后推出的代表性集体著述,如《外交探究》^①、《国际社会的扩展》^②等也具有浓郁的比较历史意识。第三任主席亚当·沃森(1972~1978年)则撰写了《国际社会的演进》这一重要著作。^③注重历史比较和分析这一特点经由代际传承,其影响所及也在后代的英国学派学者的工作中得到了反映。

在《全球转型》之前,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合著并于2000年出版了《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该书便是这一学术路径下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匠心独具的力作。该书副标题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再建构”,试图重新探讨国际体系和世界历史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互作用。两位学者之所以共同撰写这部纵横捭阖的大著,是因为觉察到了存在着他们称为“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ghtjacket)的现象,即多数国际关系学理论都被无意识地锁定在相对狭窄的欧洲和西方历史的范围之内。这一现象就好比是一件“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严重地阻碍了国际关系学对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之外的国际关系形式的瞻望能力。这意味着,不同于欧洲和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视角基本上被排除在了国际关系学理论的建构之外。^④基于这一认识,该书在时间对象上自古至今向下延伸,在地域范围上放宽视野,远远超越了欧洲区域,真正覆盖全世界范围。《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是一部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的力作,也是重视历史对于国际关系学理论建设之意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其重要性可能还没有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大历史的国际关系学要求研究者具有宏大的视野和深厚的学养,这对研究者的学术素养提出了要求。

同样出于对历史的重视,出于他们所认为的19世纪竟未受到国际关系学的足够重视这一认知,布赞和劳森撰写了《全球转型》专著,该书副标题为“历史、现

①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6.

②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③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④ 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中文版序言》,载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刘德斌主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沟通》,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代性与国际关系的生成”，他们认为：历史的动因对于当代世界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具有重大的作用。人类的事务是复杂而偶然（意外）的。历史的发展也常出现不可预测和随机的事件。当代的国际秩序是由 19 世纪发展而来的，其中工业化、理性国家和“进步的”意识形态构成为全球转型的三大动力，而三种动力的互动生成了新的权力基础。于是，19 世纪的现代性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力量差距、中心—边缘国际秩序以及“有中心的全球体系”。

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外交革命以及现代性的成长使欧洲发生脱胎换骨般的转变，由此确立起一套新的制度和规则。此后，随着欧洲国家的对外殖民扩张，这些制度和规则扩展到世界各个地区，导致全球性的转型，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 19 ~ 20 世纪国际体系的关键要素，如工业化、主权、外交制度、国际法、跨国性行政组织等。

由此我们可以发问，非欧洲地区，如 19 世纪的亚洲又如何？19 世纪的东亚各国被动无奈打开国门后，接受了来自外部的有关主权体系的各种规则，而成为了全球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到来并“叩关”之前，亚洲存在着一个自主运作的体系。在绵延伸展的许多个世纪中，亚洲各政治实体间经由多年的互动，形成了自身的关系构造。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称呼，有的称其为“天朝礼治体系”，有的称之为“华夷秩序”，而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名称则是“朝贡体系”。根据本文作者迄今所知，这一名称来自于西方，后来逐渐为研究者们所熟悉并使用。然而，“朝贡体系”这一术语很容易产生误导。它是单向度的，把东亚的传统秩序描述和理解作为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其原本丰富的内容和内涵，包括其内在的关系原理等，故应该由更为准确的名称来取代。这一亚洲体系立基于自身的文化精神，有着与欧洲十分不同的运作原理，也在漫长的岁月中保持了基本和平的相互间关系，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国际体系的研究。

非西方的历史在多年间被国际关系学所忽略，直到近些年间，这一状况才有改变。中外的国际关系学界对此加大重视，使其进入国际关系学的主流，成为其

中的组成部分。^① 这一研究取向有望在未来产生更为丰富的学术成果。

《全球转型》一书还认为,迄今为止的全球转型经过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方—殖民国际社会,从18世纪末持续到1945年左右。第二个阶段是西方—全球国际社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持续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两个阶段都代表了“有中心的全球体系”的形式,其中“有中心”意味着发展高度不平衡,主要是西方居于核心,占居主导地位,“全球主义”(globalism)则意味着国际秩序的联结是世界范围的。我们正在进入全球现代性的第三阶段,即“去中心的全球主义”(decentered globalism)。“去中心的”指的是标志着全球转型的构造不再集中于少数国家,而是日益弥散。“全球主义”则标志着基本的延续性和相互联结,也标志着早先阶段全球转型的加强。^②

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终结的今天,全球体系的一些要素正在发生和经历着深刻的转变,新的全球转型正在发生。

从20世纪后半叶至今,亚洲地区经济和政治发展蓬勃展开,亚洲日渐崛起于世界。先是日本战后实现了经济复兴和高速增长,1968年即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接着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再加上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它们与日本一起形成了梯度发展的“雁阵”。然而,正在更为深刻和重大地影响世界的还是中国的崛起。中国辽阔幅员和体量巨大,因而其具有的影响力和冲击力是其他亚洲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迸发出了极大的活力。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先是于2004年超越意大利,以后数年又先后超越法国、英国和德国,接着又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当今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

当新兴经济体不断出现在地平线上之时,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进而在世

^① 西方学界较有代表性的是康灿雄的《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易五百年》。David C.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中译本[美]康灿雄著,陈昌煦译:《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易五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则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的一部合集为周方银和高程主编的《东亚秩序:观念、制度与战略》,周方银、高程:《东亚秩序:观念、制度与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②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73 ~ 274.

界政治中的分量相应地便呈现相对下降态势。就单个国家而言是如此,由西方七国组成的集团(G7)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包容了有关新兴经济体的20国集团(G20)则应运而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自美国爆发并迅速蔓延,一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些经济体先后应声“倒下”。在这一形势下,七国集团被证明无力应对汹涌的危机,而原本在财长和央行行长层次上已经存在的20国集团被迅速提升到了峰会层次。如今,七国集团依然存在,但它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中的影响力已然不可同日而语,而纳入了多个新兴经济体为其成员的20国集团的地位上升。2016年,中国主办了20国集团杭州峰会,由于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份量,该组织因而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

全球转变的动力或动因不可能是单一的,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随着信息技术的突破,世人的通讯手段正在经历革命性的变化,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从传统的报纸和电视转向了社交媒体,民众的力量经由新式的通讯手段表达出来,民粹主义思潮借之大行其道。“黑天鹅”事件一个又一个地出现。难民危机和非法移民现象极大地冲击了人员、物品、劳务、货币自由流动的趋势,出现正逆两种趋势的对冲拉锯。贸易投资领域的进程同样如此,推进自由化的力量和本土民族主义的力量也在拉锯和角力。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进一步加剧了原先已经存在的矛盾,全球性的人流、物流为之“休克”。面对来势汹汹的全球公共卫生威胁,美国和中国本可联手合作抗疫,以拯救自身及他国于水火,然而事实却是美国隔岸观火,防疫应对失策。两大国相互指责导致本已紧张的中美关系更见恶化,大国竞争有愈演愈烈之势。

当前,世界力量的变移在继续,因而全球的转型也在继续,其根本动因在于不同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原理在发挥作用。如果说苏联解体后,曾经出现了美国独步天下、傲视群雄的“单极时刻”的话,那么这个单极时刻今天已不复存在,世界正日益成为一个多中心或无中心的世界,也即布赞和劳森所称“去中心的全球主义”。在这一意义上,作为大历史国际关系学的《全球转型》一书为我们提示了探讨全球新转型的一种可行的思考路径。